

印度农村妇女的非独立性对反贫困进程的影响

吴臣辉

(保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政史系, 云南 保山 678000)

摘要: 自独立以来, 印度政府就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 实现社会公正,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 成就虽不少, 但农村贫困问题仍然凸现: 贫困人口居高不下, 农村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印度性别歧视一直存在, 左右着政治、经济及思想领域, 使农村妇女处于政治上的边缘、经济上的依附和婚姻家庭上的从属地位, 印度农村妇女这种非独立性地位对反贫困进程起着弱化作用。

关键词: 印度农村妇女; 非独立性; 反贫困; 影响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8)03-0061-04

The Impact of the Dependence of Rural Woman in India on Anti poverty

WU Cherrhui

(Baoshan Teacher College, Baoshan 678000, China)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independence, the Indian government has strived to eliminate poverty in its rural areas and to realize society equity. Half century has past,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whil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is still prominent, poor people still account for a large par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gets even bigger. Due to the influences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sexual discrimination has long been existed in India, which has been influencing politics, economy and people's thinks and has marginalized women in politics and resulted in their dependency in economy and marriage. The dependence of Indian women is offsetting the effect of anti-poverty process.

Keywords: Indian rural women; dependence; anti poverty; impact

农民是印度农村反贫困过程中的主体。他们既是农村反贫困的直接参与者, 也是反贫困成果的直接受益者。作为人口半数的印度农村妇女独立性问题在反贫困过程中的作用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 也同时影响反贫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 重视农村妇女素质的提高, 克服影响农村妇女发展的障碍, 提

高农村妇女在政治、经济及婚姻家庭中的独立性地位是印度反贫困进展顺利的重要举措, 也是全面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印度自1947年取得民族独立以来, 历届政府都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 实现社会公正。经过近半个多世纪的努力, 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印度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收稿日期: 2007-08-28

作者简介: 吴臣辉(1968-), 男, 江西兴国人, 保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讲师, 硕士, 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

出现持续增长，而农业增长速度缓慢。2004~2005年度服务业增长了10.2%，工业增长了7.4%，而农业仅增长了1%；2005~2006年度印度GDP增长率达8.4%，其中服务业增长了10.3%，工业增长了7.6%，而农业仅增长了3.9%^[1]。

2001年印度人口10.27亿，总劳动力人口4.02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口为2.34亿，占总劳动力人口的58%，其中男性劳动力为1.4273亿，占男性劳动力总数的51.9%，女性劳动力为0.9133亿，占女性劳动力总数的71.8%。28%（近3亿）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果按照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计算，则贫困人口约为3.9亿，农村贫困人口2亿以上^[2]。

印度农村贫困人口居高不下，究其原因与农村妇女的政治地位、经济能力、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非独立性地位密切相关。

一、政治地位中的边缘性影响了农村妇女参政议政的效能

政治地位往往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参与者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参与者的政治状况。印度农村妇女在种姓制度的长期影响下，在经济上表现为深刻的依附性、缺少从业自主权；在政治上表现为服从父权制的安排。

女性从生下来就被当作特殊的性别角色，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成为男性主宰的奴隶，印度婆罗门教的古代经典《吠陀经》中，把狗、乌鸦和女人归于同一等级，称女性是失去了智力的而且不适宜接受教育^[3]。

詹姆斯·米尔在《英印历史》一书中，认为印度是最野蛮的人类社会“在野蛮的民族中，妇女总是受到羞辱，而在文明的民族当中，他们总是高贵的。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越印度人对于他们的女人的习惯性蔑视了，……她们受到了无以复加的羞辱”^[4]。

长期以来，印度农村妇女在为反贫困贡献自己聪明才智的同时，也承受印度传统观念带来的种种歧视，其基本特征是基于性别歧视的男女不平等，其核心就是男尊女卑、三从（出嫁前从父、出嫁后从夫、夫死后从子）的角色定位。社会将社会活动、上层建筑等具有权力

和权威性领域赋予了男性，而将家庭、养育孩子等私人范畴赋予了女性。这种观念，在古老印度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已渗透和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并规范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心理情操，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积淀被传承下来。

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虽然颁布了宪法和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农村妇女平等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为其发挥潜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历史机遇，使得少数印度农村妇女在经济、文化、教育和家庭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是印度种姓制度的传统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印度国人的头脑中，加上农村各种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印度农村妇女参政议政的情况并不乐观。“印度妇女在历史的发展中，从来都没有所谓的黄金时代，即便是古代杰出的妇女，都没有办法逃脱父权制的幽灵。在婆罗门时代，婆罗门被认为是最高等级，妇女被排除在等级之外；穆斯林统治时期，厚厚的面纱让妇女与世隔绝，一夫多妻制使得妇女沦落为一件随时可能被丈夫冷落、抛弃的物件，自由和权利更是无从谈起”^[5]。

在反贫困过程中，虽然实现了村民自治制度，赋予了农民直接行使管理的权利，但由于种种原因，参政议政仍然是男人们的事情，广大农村妇女仍然是处于边缘地位，扮演着“配角”角色。由于妇女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的高低，与其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决定着妇女的参政意识与能力，影响着妇女的参政水平。在反贫困过程中，要使农村妇女的参政水平和社会地位真正得到提高，成为推动农村民主进程、经济建设的原动力，就必须提高农村妇女的维权意识、政治热情、受教育程度及把妇女从繁琐的家务活动中解放出来。

二、经济地位中的依附性削弱了农村妇女主力军作用的发挥

女性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经济发展快慢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印度农村妇女在农业劳动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农村贫困人口中占很大比重。

长期以来，印度农村妇女没有形成经济上的独立地位，依附于男性。《摩奴法典》视女

人为终生处于次要地位的人，必须受某个或其他人的保护。“妇女幼年处在父亲监护之下，青春期处在丈夫监督下，老年处在儿子保护下，妇女决不应任意行动”^[6]。她始终不可能有个人的存在可言，她的财产是属于监护人的，由此限制了她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

印度农村大部分妇女综合素质较低，制约了妇女在农村反贫困过程中的发展。许多农村妇女只受过中小学教育，甚至还有相当比例的文盲。在农村由于长期的性别不平等观念的影响，妇女对自身的期望值也较低，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妇女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受教育程度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妇女在反贫困过程中作用的发挥。大多数农村妇女虽然已经是家里主要的劳动力，但精神上她们对丈夫的依附性仍然较强。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导致农村妇女所拥有和所能利用的资源偏少。她们对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如对现代化农用机械等，不能有效地使用。

在印度农村，资金匮乏是妇女在反贫困生产经营中最大的障碍之一。小额款项多是向亲戚朋友借款，或是高利息贷款，不能及时得到低息贷款扶持，即使贷了款，条件手续烦琐，而且贷款限额非常低，不能解燃眉之急。资金上的困难，导致脱贫致富项目难以实施或难以达到预期效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妇女脱贫的障碍、致富的阻力。虽然政府积极协调银行在信贷中增设了帮助农村妇女脱贫致富的贷款项目，但这与广大农村妇女的需求相比却是杯水车薪。

提高妇女的各种能力，增强妇女的经济自立，帮助以妇女为户主的家庭摆脱极端贫困状况，成为近年来政府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现在印度妇女和儿童发展部以及农村发展部都有许多增强妇女能力、提高妇女地位和保护妇女儿童的相关工程。现在各部都强调充分动员妇女的参与，注重妇女能力的提高和促进妇女经济自立。

三、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从属性弱化了农村妇女主体意识的提高

印度的文化结构虽然是多元化的，但印度北部的主要家族体系同中国非常相似，在父系

家族和女到男家结婚落户体系内，这种男性家长制文化为特征的印度社会，家族只是通过男性来定义的，这种家族导致了强烈的男孩偏好和对女孩的歧视。

农业社会中妇女们更多地扮演生殖角色，尽管她们也能给予农业经济某些支持，特别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劳动和活动发挥作用。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她们逐渐失去了与市场 and 资源的联系，社会剥夺了她们的土地和财产，使她们成为起初是父亲，然后是丈夫和儿子的财产。随着反贫困化进程深入，农村妇女的地位有所改变，但她们还是印度社会中贫困、无知的阶层。

印度独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改善妇女婚姻家庭地位和经济能力的法案，如“印度教徒结婚与离婚法”、“妇女继承财产权力法”、“禁止嫁妆法”、“禁止童婚法”等法案。独立后的印度妇女在婚姻家庭与经济地位不能与独立前同日而语。虽有不少城市妇女受教育与识字率上升，成为专家教授和担任政府部门要职的也为数不少，但农村的妇女尤其是印度北方邦的农村妇女婚姻家庭地位改变不大。

在男性家长制的印度社会，重男轻女之风非常盛行，早期印度教的经典《爱达觉罗氏梵书》中说：“儿子对父亲来说是一条救生船，在他身上有着无瑕的天堂的世界；女儿是悲伤的源泉。儿子对父亲来说，才是来自天堂的最高层的光芒。”^[7]男婴是父母死后升入天堂的必备条件，父母死后要儿子亲自点燃焚尸的柴堆，否则就无法升入天堂轮回，要永世受地狱之苦。如果第一个是女婴，要么这个家庭会继续生下去，直到有个男孩为止；要么对刚出生的女婴实施溺杀，在泰米尔纳杜邦马杜赖农业区的一份医院记录证实，该地区10年出生的600个女婴中有450个被杀死。据估计，2001年全世界大约有6000万妓女，而印度的妓女就有250万人^[8]。一般来说贫困和饥饿是迫使妇女卖身的主要原因，但在印度的贫困山区和边远地区农村，不少父母卖女大多是为了抵债，或者是为了年迈多病的父母和幼小的弟妹，若要被逼死或饿死时，还不如卖几个钱抵债，不但女儿可以求生，家人也可以逃过难

关。1980年5月,印度的一份杂志《莫奴希》报道:“在奥里萨邦,人贩子仅以14卢比(不到1美元)或15卢比就可以买到一名少女,然后将其高价卖到妓女院。甚至有些妇女是被自己的男人卖到妓女院的”^[9],男人把年轻的少妇卖到妓女院抵债,待这些妇女青春年华过后再低价赎回来操持家务。

现在印度不少中等家庭在为女儿置办嫁妆时所花费的钱财,少则数十万卢比,多则百万卢比,贫困家庭因置办女儿的嫁妆变得更加贫穷,甚至负债累累。由于必须支付嫁妆使女孩受人欢迎,通过虐待妇女试图来欺诈和索取更多的嫁妆导致了嫁妆暴力。有些新娘的嫁妆不能满足男方家庭的欲望时,新娘的悲惨命运从此开始了。不少妇女因忍受不了夫家的折磨和嘲弄自杀身亡;更有甚者新娘被夫家活活烧死。每年全印度有数千名妇女因没有足够的嫁妆而被丈夫、公婆和小姑子害死,仅1986年就有1666名妇女为此死于非命^[10]。据统计,1990年有4148件嫁妆死亡事件,9518名妇女遇到过身体受辱和强奸事件,20192件其他原因的犯罪事件。印度北方邦,这类事件发生率很高^[11]。

印度长期以来存在童婚制,尤其是在印度偏远的农村山区更为盛行,印度政府虽颁布《禁止童婚法》,但在农村还是屡见不鲜,拉贾斯坦邦是童婚最盛行的地方,该邦的童婚率为56%,女子的婚龄为14.5岁。印度的传统观念认为丈夫的年龄大自己三倍是正常的事情,女子8岁而她的丈夫可能是24岁甚至更大,在大街上看见年轻女子挽着老者行走,他们不是父子或祖孙关系而是夫妻关系。这种童婚制(或老夫少妻)容易造成年轻的妻子守寡,寡妇被认为是凶兆、不吉祥和倒霉的代名词。她们没有继承丈夫遗产的权利,更无再婚的权利,只能终生待在家中做繁重的家务和体力劳动,还要忍受公婆、兄嫂、小叔子、小姑子和左邻右舍的歧视与虐待,特别是在有些落后的偏远山村还存在为夫殉葬的陋习,年轻的寡妇活活被烧死为死去的丈夫殉葬。

自从独立后,印度妇女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印度政府及各种妇女组织为扫除妇女

文盲做出了许多努力。到19世纪80年代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还是远远低于男子,印度各邦的教育水平差异很大,教育水平最高的克拉拉邦,那里的妇女识字率是73%;九个教育落后邦之一的拉加斯坦邦,妇女识字率只有12%。印度5000万失学儿童中有3/4是女孩子,接受大学教育男子和妇女比例是100:38^[12]。

印度农村妇女在政治、经济和婚姻家庭中的非独立性,为反贫困的顺利进行造成了重重障碍,反贫困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仍然没有完成,农村贫困人口居高不下,妇女儿童的地位还是处于社会的底层。反贫困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必须把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从传统观念与社会的各种歧视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与男子在政治、经济及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平等,才能提高农村妇女在反贫困过程中的主体意识,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出主力军及其参政议政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杨东群,李先德.印度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现状及问题^[J].世界农业,2007,(6):44.
- [2] 王晓丹.印度的农村建设[J].南亚研究,2006,(2):31.
- [3] 吠陀经.孙瑶.妇女与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J].南亚研究季刊,1996,(2):56-57.
- [4] James Mill. 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v. I & II [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68, 309-310.
- [5] 陈义华.印度后殖民妇女史与妇女研究的互动[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8):47-48.
- [6] 马香雪译.摩奴法典(第九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
- [7] 爱达觉罗氏梵书. S. C. 克劳福.印度教徒种族观念的演变[M].夏威夷: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2.29.
- [8] 吴永年.种姓陋习:印度教妇女的悲惨命运[J].国际展望,2001,(2):88-89.
- [9] 同[8].
- [10] 同[8].
- [11] 孙瑶.妇女与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J].南亚研究季刊,1996,(2):57.
- [12] 王晓丹.当代印度妇女[J].南亚研究,1993,(4):31-32.

[责任编辑 崔凤垣]